



箭台山上俯瞰涪口城区

株洲风物

箭台山上话古今

马焱明

06

株洲日报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 朱美楠 电话 28823906

投稿邮箱

本版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伏波庙



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茶陵县涪江街道华山村,河畔立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理石碑,系为纪念侵华日军入侵茶陵期间死难同胞所设。

1944年4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因湘南地形复杂,交通重要,国军湖南战场总指挥薛岳有意识地将衡阳作为抵抗日军的重点地方。6月,日军一路南侵,采用主力奇袭与侧背包抄相配合的战术,向衡阳及其外围之醴陵、攸县、茶陵、安仁数县同时发起攻击。

6月26日,日军开始进攻茶陵,7月14日,茶陵城陷落,至此,茶陵境内东北起自边陲小集镇化整,西南止于茶安两县边界之境界首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两侧(包括今云阳街道、涪江街道、思聪街道、下东街道及秧堂、高院、火田、腰路、虎路、严塘、马江、轿船、枣市、界首等乡镇)全境或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陷入敌手,至1945年2月26日,日军撤离茶陵,前后盘踞茶陵达八个月之久。为此,茶陵人将日军占领茶陵的这八个月称为“黑色八月”,期间,发生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野蛮的屠杀,迟来的纪念

1944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一)上午,日军以茶陵城郊村民于27日配合县自卫队在城墙上杀死一名日本兵,并夺走了枪支马匹为借口,开始对村民们实施野蛮的报复性集体大屠杀。他们分兵袭击城郊首善镇瓦上村(今城关镇农林村)毛里甲(今农林村一组)、龙家里(今农林村二组)、龙家里80多个无辜村民被打落水,射杀在“血泪塘”(在农林村十二组),毛里甲37个村民被驱赶到河滩边,惨遭了同样的厄运。同一天下午,一群日军扑向山头园里(今农林村七组),将130多个村民逼到“血泪一塘”,在日军的刺刀下,村民的累累尸身填满了水塘。

30日清晨,一群日军再一次窜至毛里甲,将30多个村民驱赶到塘边,在日军的乱刀砍杀中丧命“血泪三塘”(当地称刘家塘)。同一天下午,另一群日军包围了山下园屋场(今农林村八、九、十组),他们潜伏在屋场附近,五点过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50多个返乡村民包围起来,悉数杀害在“血泪滩”(在农林村八组)。

9月3日中午,日军在村民返乡安葬死者时,突然闯入上头园(今农林村六组),64个村民全部殒命于血泪二塘。

据事后统计,在此之前,瓦上村本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1200多人的大村庄。经过8月29日到9月3日的大屠杀之后,突然丧失了879人,减少了47户人家。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说,当时目睹将来不及逃走的无辜村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抓住不放,凶残的日军,有的抓住小孩按在地上活活扯死,或者用刺刀捅入肛门活活杀死,有的抓住老人用春米的木碓生生地砸死,他们用棕绳把抓来的村民捆住之后,赶往池塘边、河滩边、水井口,用刺刀捅死后丢入水中,或者推入水中再用枪射击,或者绑上楼梯石头浸死,或者丢入水井中,然后用尸体封住井口,将井中的人憋死。当有人反抗时,他们把反抗者捆绑在树上,用刀一刀一刀地杀死,或者用香火慢慢熏死。

8月29日晚,同样的屠杀发生在比子巷河滩。日军从东出发,兵分两路包围了涪江乡下窑井路上,13个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日寇逼到东河边比子巷,对生的孩子最先被日军射杀在河里。日军将其余12个村民4人一组捆绑住后,再推落水河中射杀。事后,这12人中,仅有陈夏英(又名陈夏姑)一人幸存。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比子巷“七·一一”惨案。

在上述屠杀事件之中,日军杀我同胞之多,杀我同胞手段之残忍毒辣,可谓亘古未有,惨绝人寰。为了缅怀死难同胞,教育后代牢记血泪历史,早在1969年,当时的城关公社(今云阳街道前身)党委主持召开了控诉日军蹂躏我同胞罪行的主题会议,决定将当年日军杀我同胞最多的水塘、河滩、河滩依次命名为“血泪一塘”“血泪二塘”“血泪三塘”“血泪滩”“血泪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塘一滩一塘”,并在“三塘一滩一塘”岸边修建了一块砖石水泥结构的简易纪念碑。这些纪念碑正反两面分别用黄色油漆写上了碑文及死难者姓名。同年9月,城关公社还举办了侵华日军进攻茶陵罪行主题展览。当时,茶陵县县委组织了机关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前往参观。

追思缅怀之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城关公社设立的五块简易纪念碑仅存四块,其中“血泪二塘”简易纪念碑于1982年被村民拆除,其余四块碑上的文字也多因年长日久而字迹漫漶,难以辨认。不仅如此,随着大屠杀幸存者的逝去,熟悉这段血泪历史的人越来越少,除少数茶陵文史爱好者之外,即连许多当地村民也对发生在此的惨案一无所知。

2004年1月,一个名叫许湘生的古稀老人来到茶陵县委、县政府,提出要建茶陵村修建纪念碑,以此纪念茶陵村遭日军屠杀的死难者。这个要求代表了所有“黑色八月”亲历者及无上屠杀、比子巷“七·一一”惨案幸存者的呼声,引起了茶陵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茶陵县委、县政府安排茶陵县档案史志局查阅档案,去惨案发生地调查,搜集整理、核实相关信息。

茶陵县档案史志局等单位工作人员在调研档案、走访调查之后,统计出了两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日军屠刀之下,茶陵有9440人罹难,17011人受伤或致残,170余户人家被杀戮殆尽;在日军蹂躏之下,茶陵有1200多栋房屋被毁,11135头耕牛、8000多头生猪被杀,71475担粮食遭抢,财产损失折合当时的法币达1264亿元之巨。

出于牢记历史、缅怀死难者、教育后来人的综合考量,茶陵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建一座纪念碑来纪念在“黑色八月”期间所有惨遭日军屠杀的茶陵同胞。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县政府拨出专款,于2004年9月在与县城一河之隔的华山村修建起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这就是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高7.5米,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它独立于涪江河畔,与笔塔塔遥相呼应,与农林村隔河相望。这座纪念碑底层为仿唐坊形底座,底座上是高高的长方体平顶碑身,除碑文之外,这座纪念碑上没有碑名题字,也不带装饰性纹饰,给人以朴素凝重、庄严肃穆之感。受县委、县政府委托,时任茶陵县档案史志局局长的彭东明先生撰写了碑文。

为适应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需要,2005年7月,茶陵县委宣传部将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茶陵县烈士陵园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11月,这座纪念碑被株洲市委宣传部分布为株洲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株洲往事

侵华日军茶陵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今昔

段立新

商代象尊,国之重器的未解谜团

郭亮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幻,一尊还酹江月。”

大抵中国传统文人,都有过月夜轻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经历,尤其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罢,望月华如水,胸中块垒顿消,此时,若是身边有酒的话,也当浮一大白,至于盛酒的器皿,就用词中所言的“尊”吧。

尊,原本是成组礼器的统称。但到了宋代尊开始专指一类酒器。这类酒器一般是侈口、长颈、或圆腹或方腹,带有圈足,比较典型的器物有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和龙虎尊。此外,《礼记·明堂记》记载“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后世一些学者根据这样的记载,也将一些铸成动物形状的酒器冠以尊名,如象尊、鸟尊、豕(猪)尊、牛尊、羊尊之类,若将这些尊置于一起,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型动物园。

尽管动物形状的尊并不少见,但是它们的造型大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而在株洲博物馆的展厅内,却展示着一件造型为大象的尊——1975年出土于醴陵县仙霞公社狮形山大队(现属醴陵市左权镇)。当然,这件象尊为原样复制品,原件现馆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内,是现今国内仅存唯一一件出土土地明确的商代青铜象尊,至为珍贵,曾多次走出国门参展。

这件象尊造型华丽,装饰精美。象的面部饱满,额头高耸,两侧饰有浮雕的蛇纹圆凸;象的眼睛生动传神,眼角细尖,眼珠略微向外鼓出,直视前方;象耳呈蒲扇形,向两侧自然舒展,耳背还浮雕有凤鸟纹;象鼻弯曲上卷,两侧有阴线水波状纹饰,鼻孔微张,鼻头两侧饰有浮雕猛犸,而鼻头转弯处则高浮雕了两只健硕呈奔跑状的猛犸造型;象口紧闭,露出粗短的门牙。

象身一改面部灵动的表现手法,铸造得敦实有力,两侧饰有高浮雕的大象龙纹,腹部则浮雕一只由折角兽头。象的臀部饰有高浮雕的兽面,兽面纹之下,两后蹄各饰一浮雕夔纹,象的四足虽直粗壮,但并非影响整体造型。两前足纹饰简单,各有一个浮雕的夔龙纹;两后足上则各饰有半组兽面纹,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兽面纹,这种布局方式十分罕见。

虽然从整体来看,象尊身上的纹饰构成复杂,但是布局有序,极具层次感,并不让人感到杂乱无章。美中不足的是这件象尊出土时器盖便已遗失,实为一大遗憾。不过,这遗憾也并非无法弥补,因为现藏于美国佛利尔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青铜象尊,其造型与狮形山象尊十分相似,而且造型完整。说不定,当年这件象尊在刚铸造完成时,也有一个同款的器盖,上面也设有与象尊形似的立象钮呢!

象尊的造型十分写实,连大象的脚趾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出来。可以肯定地说,当年的工匠们不仅见过大象,而且对它们的身体构造非常了解,否则此尊很难如此准确地展现出象的神韵来。

那么,问题来了,据相关学者研究,象尊原型是亚洲象,如今多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内仅能在滇南的原始森林中找到它们的身影,不管是象尊的出土地醴陵,还是殷墟所在的河南偃师——有学者认为此象尊系商人南迁的遗物,并非湖南本土铸造——现今都无野生象群的踪影,又如何能让匠人们观摩成像并作艺术加工呢?

其实不然,商周时期的气候远比现在湿润,大象这一热带动物亦曾遍布华夏各地,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屡有“获象”之记载,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在殷墟发掘出两座象坑,是商代时用象祭祀的遗址。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在西北岗墓葬中又发现了一座象坑,而且大象的脖子上还有一个硕大的铃铛,说明已经有驯象的事实。同样在殷墟的妇好墓,还出土了绿松石象牙杯、象骨器、玉象等与象有关的文物。而且,殷墟所在的河南,从来就是古豫州的腹地,直到今天河南仍简称“豫”,“豫”在《说文解字》中有“象之大者”的含义,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豫应该是“从象从邑”,意思为大象之地。从这个命名方式来看,豫州也就是包括今天河南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当以产象而闻名,更遑论气候更为湿润的湖南了,工匠们以之为参照对象,烧制造型精美的象尊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相关文献记载,目前海内外博物馆中收藏的青铜象尊已发现五件,其中商代象尊三件,除本文提到的这件象尊之外,另两件均馆藏于国外(美国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巴黎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另有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西周鸟纹象尊和馆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无法证实确切年代的象尊各一件。青铜器是商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商代文化艺术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各地出土过数量、形制不一的商代青铜器,涵盖彼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惟有这青铜象尊,能确定属商代铸造的则只有目前发现的这三件,且出土地点也颇令人费解。

湖南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出土于醴陵狮形山,据传国外的那两件亦出土于湖南地区,商周时代的湖南地区尚是一片未被开发的蛮荒之地,何以会出现如此精美的象尊?不特如此,像四羊方尊、四方彝、人面方鼎、虎食人卣之类的“国之重器”亦出土于湖南。有学者据此推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当为商人南迁时的遗物与证明,可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商人聚居地中原一带的青铜器多出於墓葬随葬,而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多见于河流山川之间,且多是单个出现,周边未见同时期的文化遗物和地层关系——醴陵狮形山出土的象尊即其典型——这也是考古学界一直未解之谜团之一。

文物名:商代象尊
年代:商代中晚期
出土年代:1975年
出土地点:醴陵狮形山
规格:通高22.9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
馆藏地:湖南省博物馆

